



中国新闻舆论史

(1968年版)

A History of the  Opinion in China

YZLI0890146666

林语堂 著 王海译

经典新闻学译丛 · 丛书主编 王海

中国新闻舆论史

(1968年版)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林语堂 著 王海 译



YZLI0890145556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闻舆论史 (1968 年版) / 林语堂著; 王海译.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8

(新闻学经典译丛)

ISBN 978 - 7 - 81135 - 632 - 8

I. ①中… II. ①林…②王… III. ①新闻事业史—中国
IV. ①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492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杜小陆 武晓燕
责任校对: 苏倩欣

排 版: 弓设计
印 刷: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报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中国报坛流派纷呈、群星璀璨，职业报人、政治宣传家报人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报人的办报活动推动了中国报业的现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1935 年，卡尔·克劳公司（Carl Crow, Inc.）出版的《中国报刊目录》（*Newspaper Directory of China*）收录了近 700 种中外文报刊。

同期的新闻学研究也十分繁荣，诞生了至今人们依然耳熟能详的新闻学经典著述。如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1928），张九如、周翥青《新闻编辑法》，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周孝庵《最新实验新闻学》，新史氏《新闻记者的故事》，徐宝璜《新闻学》（1918）、《新闻学大意》、《新闻学纲要》（1930），徐宝璜、胡愈之《新闻事业》，黄天鹏《现代新闻学》、《新闻文学概论》（1930）、《新闻学讲座》、《天庐谈报》、《中国新闻事业》、《新闻学刊全集》（1928）、《新闻学名论集》（1930）、《新闻学演讲集》、《新闻学论文集》（1930）、《报学丛刊》，任白涛《应用新闻学》（1922），戈公振《新闻学撮要·言论自由》、《中国报学史》，李公凡《基础新闻学》（1931），邵振青《新闻学总论》（1919），王解生《新闻纸改造》（1923），王文萱《新闻之话》、《新闻概论》，吴定九《新闻事业经营法》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学经典著述中，中外学者和报人撰写的几部新闻学英文著作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如汪英宾著《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24 年版), 赵敏恒著《外人在华新闻事业》(*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白瑞华 (Roswell S. Britton) 著《中国报纸 (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上海别发洋行 1933 年版,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年再版), 林语堂著《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1936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 1968 年纽约 Greenwood 出版社再版)。在国际传播和中国新闻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些新闻学经典文献翻译为中文。

这套冠以“新闻学经典译丛”的丛书首批推出三本译著: 白瑞华《中国报纸 (1800—1912)》、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赵敏恒《外人在华新闻事业》。

白瑞华《中国报纸 (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7 年版)、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三本新闻学著作的出版时期接近, 同时代的三位作者相互借鉴观点, 对中国近代报刊和新闻事业各自展开论述。国内外学者对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和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英文版) 的熟悉程度要高于白瑞华的《中国报纸 (1800—1912)》(英文版)。戈氏《中国报学史》堪称中国新闻史的奠基之作。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权威性著作《中国报纸 (1800—1912)》^① 集中体现了白瑞华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认识及其新闻思想, 是关于近现代新闻事业开始而本土报纸消亡时期中国报业的概览。虽然白瑞华在前言中提到“本书只是关于中国报业的描述, 并非专业论著”(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Ch'eng-wen Publishing

^① [新加坡]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249 页。

Company, Taipei, 1966: preface), 但书中的数据基本都是原始的一手材料。白瑞华还充分利用《中国报学史》的相关知识和早期报刊研究的资料,考证并扩展了戈公振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关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33: 79)。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英文版)曾经“对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过影响”,“在50年代前后还是美国大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指定参考书之一”^①。在撰写《中国新闻舆论史》的过程中,林语堂充分利用“(戈公振和白瑞华)两位德高望重的先驱的研究成果”^②。不过,林语堂更加信奉戈公振及其著作的史学资料,“所用史料大多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前人之作和刊载于当时报刊上的现成材料。戈氏错了的,林著照错不误,还起而为戈氏的错误辩护”^③。“他之信任戈公振,已经到了盲从的程度了”^④。

赵敏恒是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国际新闻界的名记者。在《外人在华新闻事业》(*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中,赵敏恒论述了西方各国在华新闻业的发展,旨在说明报刊文化和通讯社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独立发展报刊、通讯社和新闻业,同时抵制西方各国报刊和通讯社渗透中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学经典译丛”是研究中国报刊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史料,填补了中国报刊文化(史料)研究的空白。丛书的出版是新闻学界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们向为丛书出版付出劳动的译者、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由于

① 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②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③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4页。

④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

丛书涉及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报刊知识，其中包括至今仍然没有定论的问题，所以丛书自然会存在不足之处，包括有待提高的翻译的细节。谨希望这些年富力强、学养深厚的译者们在以后的中国报刊文化研究和译事中做得更好。

刘家林

2010年12月于广州暨南大学羊城苑

目 录

1	总 序
1	第一章 引 言
	第一部分 古代时期
10	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报纸
18	第三章 古代歌谣
27	第四章 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运动
39	第五章 魏晋时期的舆论限制
45	第六章 宋代的学潮
57	第七章 明朝的宦官、御史和东林党人
	第二部分 现代时期
73	第八章 现代报纸的开端 (1815—1895)
91	第九章 辛亥革命前的报纸改革 (1895—1911)
108	第十章 民主共和时期的新闻事业 (1912 年之后)
123	第十一章 当代新闻事业
147	第十二章 当代期刊
162	第十三章 新闻审查制度
175	附录 林语堂年表
192	译后记

第一章 引言

像古代其他国家一样，古代中国饱受报纸缺失之苦，当时中国的民众无报可读。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报纸，而且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国报业才成为重要的独立商业组织。现代中国报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技术层面上，从新闻收集、发布和编辑艺术的角度来看，中国报纸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报刊被视为舆论工具的同时正在走向腐化，至少现在看来如此，而某些独裁政权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报纸在这方面可能引领着潮流。

这似乎是过于严肃的判断，但一般情况下，报刊新闻对我们而言是无意义的或者关系不大的，除非我们遵循新闻自由的理念，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报纸的业绩，进而通过以下路径把新闻自由构筑为民主的真实基础。首先，我们要用科学而公正的方法来取舍、编辑和发布新闻，从而为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其次，我们为舆论表达提供自由而无约束的环境。报刊的印刷和发行技能则成为次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关注更加宏观的问题——新闻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着发布公共信息和舆论的角色，因而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进程。何种因素促使报业来贩卖、兜售数以千万计的官方的扭曲信息和宣传资料，使成千上万的国民每天在阅读和接受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客观上得到大众化的教育，而这百万的受害群体却没有一人能借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报刊的发行量很大，但这对新闻自由却是一种嘲讽，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裨益只有动物王国可以享用，而人类还远未触及，除非人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有申诉

和抗议的自由。

这里，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带有局限性：笔记者往往并非是对事实材料感兴趣的人，除非他们把目光瞄向舆论力量及其如何展现中国民主的根基问题。这其中又包含着一个原始的准则：一个好政府总是倾听民众的声音，使国家逐步发展壮大，有时甚至达到兴盛之治；更何况有时国家还因为当政独裁统治者的腐败而遭受严重的摧残。在这些史料的表象背后，我只是有幸认识到它们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深层意义。在公元前12世纪中国最早的某些历史文献中已陈述过“天听自我民听”^①这样的经典准则，而后来被普遍接受的一个准则模式是，“在一个好政府统治下的社会中，言论渠道是自由而畅通的”^②。本人有兴趣观察这条准则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是如何运用的，它是如何伴随着人类血肉生死的代价而得以争取和捍卫的，以及它是如何受到中国历史上所谓“铁腕”执政者的一贯压制的。换言之，从笔者的考察来看，中国新闻史就是民间舆论和中国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

毫无例外，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历史时期，舆论和当权者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场争斗或者冲突。从理论上讲，人们并非总能认识到这一点。对这个事实的认知必定形成任何现实、明智的政治哲学的通用原则，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对立。对于政府而言，无论它是民主制、君主立宪制还是君主独裁制的政体形式，统治者和民众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拔河式的博弈和较量：假如政府赢了，民众肯定输了，反之亦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民主以及限制自由和约束当权官员们的各种手段和谋略就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君主独裁制只不过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在

^① 《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② 在明朝早期，没有官职的普通学者被朝廷相关部门收录，朝廷鼓励他们向皇上呈送改革奏章和建议。

这种体制下，政府允许自己在绳子的一端拉动，而禁止民众在另一端拉动，但潜在的敌对态度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的。所以，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这场拔河赛中，可以说公众批判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政府中。

像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一样，中国政府总是认为，政府能够独立应对这种公众批判的情势，而且能够抵制来自外部环境的批评；同时，中国民众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坚持认为，当权的政府可能是他们遇到的最腐败的政府。政府总是声明，它在为民众考虑，而极不情愿倾听民众对政府的意见。政府的真正意图就是，民众应该停止共同的思考，像顺从的聋哑的不会思考的羊群那样，按照政府的意愿被驱赶到牧场或者屠宰场。孔子曾持这种观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自从倡导民主革命运动以来，革命者一直试图把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独裁的原则转变为一种民主式的格言，而且努力使孔子成为一位民主的先哲。由于标点符号的妙用和汉语语法关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模糊使用，孔子的话可以诠释如下：“允许民众行事，但不可使民众明白。”然而，这种解释偏离了孔子的观点，他像其他所有的统治者一样，认为在实施任何政府措施时，让民众了解得越少越好。一种推理可以证明这个观点：如果马能够与骑师交谈，那么比赛根本就无法进行了。赛马游戏必须靠鞭笞才能取得胜利，至少骑师们和全世界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子是这样认为的。民主政府、议会或新闻媒体中持这种观点的任何人都会说，马应该与其主人交谈，并不时地对骑师们的动机和才智提出质疑。这就是一个遵循新闻自由的媒体总是置政府于尴尬境地的原因。

但中国的“马”坚持与“主人”对话，甚至在独裁政府统治时

^① 语出《论语·泰伯》。——译注

期也从未停止过。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中看到，在中国这个民众应该能够阅读和书写的国度中，尽管受到限制和约束，民众还是在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批评政府的作用。有时候，这种批评甚至成为政府所畏惧的一股力量。由于缺乏宪政的保护，这样的批判运动不可避免地因遭到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当国家处于残暴统治之下和官场腐败猖獗之时，或者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威胁的时候，或者当朝廷落到少数弄臣或宦官手中的时候，这种运动就会发展成为重要的势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民众的声音就要爆发，为此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当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时，他会有果断而明晰的观点，由个体组成的国家也是如此。这种对国家事务进行无畏批判的运动，构筑了儒家学者的光辉篇章，彻底否定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对公共事务冷漠的态度。从另一方面来讲，学士们对宦官统治的反抗似乎是基于蔑视和义愤——他们蔑视宦官，因为宦官是文盲和身体不完整的被阉割之人，他们只是凭借迎合后妃的嗜好和统治者放荡不羁的生活来获取权势；对宦官的义愤更是由于这些被阉割的人盗取了朝廷的权力，而按照中国的传统，这些权力本应该属于学士们。更加直白地讲，学士们反对宦官是基于其性别和阶层偏见。在诸如蔑视和义愤这样的人类情感和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危的压力之下，学士们总是发出他们的心声。因此，我们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国舆论和朝廷之间的争斗中，学士们总是极力反对宦官，而宦官们却总是取得胜利。从人类历史有记载时起，宦官和“宦官的继承者”^①就一直充当着最佳新闻审查者的角色（参见第七章）。

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官方报纸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朝，即公元前2世纪，并且自唐朝以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持续发展。在公元8世纪唐明皇统治时期，官方报纸早已为人们所了解，从那时起到清

^① 宦官常收养或过继别人的子女。——译注

朝，官方报纸主要在官僚阶层发行。但这种官方报纸主要发布官宦任命、提升或者解职的消息，还不算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体，肯定还不属于舆论喉舌。我们有必要回顾这种官方报纸的原始面貌。

然而，在古代中国，公众批判远比报刊重要得多。因为两者并非同生相长，仅仅通过调查古代报纸来研究中国古代舆论显然不妥。在中国，民众的识字率非常有限，普通人很少思考当下的政治；直到政治开始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才干预政治。因此，公众批评力度的强弱与民众识字率的高低是成比例的。但是，在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阶层中总是流行一种舆论，这种舆论在国家处于危机时往往可以突变为常规的民众运动，成为有组织的和能够表达思想的，并进而演变为支配舆论的有生力量。当这样的公众批评具备了自身的优势时，它就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范畴，而是沿用类似社论主编的方法倾其全部力量直捣时事话题。有时候，这种批评往往会卷入关涉社会公正的案例中，正如法国知识界人士牵连到德雷福斯事件^①一样。

当政府腐败透顶或者国家被外国侵扰的时候，我们尤其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最值得称奇的是，在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三个历史时期，就出现了这样有组织的舆论活动并以各种缘由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例如，汉朝后期的“清议”运动和学生运动，南宋（汉人的王朝在被蒙古人灭亡之前，处于扬子江北金王朝统治的阴影之下）以及在清朝入侵之前明朝末年朝廷腐朽统治期间的运动（明朝末年的学士们联合起来对宦官集团进行无畏批判，因为宦官致使国家落入无序和道德败坏的境地）。舆论力量似乎总是在国家生死存亡

^① 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之一。1894年，犹太裔法国炮兵军官阿尔弗列·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被诬陷通敌而入狱，事后证明此案纯属误判，但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拒绝改判。经过十余年的反复斗争，德雷福斯终于在1906年洗清冤屈。——译注

的关头起到支配的作用，假如舆论被正确的领导者所引导或者被国家的安危所激励，它的确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达到以弱敌强的效果。

我之所以对这样的研究感兴趣，是因为它预示着中国未来出现敢言和诚实的报纸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的影响之下。如果西方民主没有遭遇法西斯思潮愚弄的话，这或许就是近十年的事情了。我上述提到的学生运动正是现代报纸在西方遇到的相同问题，它们表现了某些中国评论家和政论家诚实和刚毅的勇气或者他们对他人的痛恨和谩骂；在现代法西斯国家中，政府也运用同样的策略，要么通过恐吓或谋杀，要么借助贿赂或官员晋升的绥靖手段来打击他们；最后，这些运动和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状况一样，表明了对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予宪政保护的重要性。因此，我没有机械地区分有形的新闻报纸和其他舆论表达的途径，因为它们都处于合法的新闻范畴，即它们都向公众传达信息，而且引导舆论的发展态势。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古代中国的舆论是如何表达的？作者和学士们是以何种形式和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公众批判的？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和成功之处是什么？他们是如何遭遇惊吓、嫉恨、利用、收买、勾结、操纵、哄骗、恐吓、惩罚和谋杀的？他们又是怎样抵制这些势力的？最后，舆论是如何遭到压制的？而有些时候，人们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出卖自己的国家而没有遭到公众抗议的？

诸如此类的公众批判通常采用古代中国所允许的下列形式之一来进行。就普通人而言，当出现像苛捐杂税或者冤假错案使人致死等恶劣的不公正案件时，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有“罢市”、“击鼓”和“拦轿”等。罢市是最有效的，往往会引起朝廷的调查，从而使地方官员被解职或受到惩罚。在学士或读书人阶层，公众批判可能是官方的也可能是非官方的。朝廷御史代表着一种奇特的新闻审查制度，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政治理论的独特而奇异之处。当时的很多御史都成为执政者的心腹或发言人，即欧洲或者美国的御用新闻记者

东方的对等物；而这里我进行观察研究的兴趣是，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正直的朝廷御史能够勇敢地面对个人的解职、死亡或者由于与官方为敌而不顾及无论如何都属于他们的宪政保护利益（参见第七章）。奇怪的是，中国政治理论承认有必要设置批评政府甚至皇帝本人的御史或言官，但对这些监察御史则没有提供个人豁免措施。当然，道德和舆论总是支持直言不讳的御史，这就使得爱面子的帝王不敢轻易地惩罚或侮辱他们，但假如一个统治者想侮辱或者杀死一位令他不快的御史，他往往就会无所顾忌地那样做。朝廷御史一直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忠诚于国家，当着皇帝的面讲出他们对皇帝的意见，因此而危及自身；要么缄口不言，保住自己的职位，因而完全承认自己的无用及其职位的虚设。当然，朝廷御史也能够蜕变为权势的最高贩卖者和私人报复的中介，或者像现代新闻业一样成为个人攻击的工具，这是一种既可以为好人服务也可以为坏人服务的工具。

除了朝廷御史和官方批评之外，学士们中间还存在一种非官方的评论家，就他们真实地代表民众的声音而言，非官方的评论家近似地等同于今天新闻界的公众批评。这种非官方的批评有时采用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和标语的方式进行。在国家 and 民族危难之际，当非官方的批评演变为一场运动的时候，没有官职或者有官职而不是官方御史的学士们，经常承担起向帝王呈递备忘录的使命，有时多达几百人联名上书。在以后的章节中，读者将会看到他们中有些人是如何运用在宫殿上“击鼓”的方法来抗议，或者自发结队在宫殿前示威，而更常见的情形是，他们成为涉及数百人的真正的群众运动领导者。其中有些运动的抗议目标直接针对某些特定人物，比如明朝末年的阮大铖案，当时数百名学士通过传单和标语^①把这位宦官的

① 《留都防乱公揭》。

心腹赶出了南京，并迫使他流亡郊外。这样的运动绝不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在下面的章节中读者将会看到这一点。在汉朝后期、宋朝和明朝，学士和太学生有时集结起多达三万人，通过对朝廷或者皇室成员行为的无畏攻击，持续不断地卷入时代的政治运动中，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很多朝廷内阁的重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第四等级^①。

总而言之，或许可以这样说，文化阶层推动着一股源源不断的公众批评的浪潮，而这个事实很少被中国新闻和舆论史专业的学生所认识。

^① 第四等级又称“第四阶级”、“第四政府部门”，与“无冕之王”是同义语，是西方对新闻界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喻示。1772年，英国记者经过多年争取获得国会旁听权，可以公开报道议员的发言和辩论，记者地位有所提高，后被人称为继贵族、僧侣、平民后的“第四等级”。松本君平在《新闻学》中写道：“第四种族者何谓耶？贵族、僧侣（欧西之教徒）、平民，为构成国家之三大种族。而其称第四种族者，发生于近几世纪，而为社会之一大现象，一大革命家……彼盖以明敏之才干，灵秀之神经，握区区一管，以指挥一大种族之趋向，即构成国民之一大阶级，而有天赋与使命之大种族也。其种族为何？即指新闻记者之一种阶级而已。”（徐宝璜等：《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第11页）。——译注

第一部分 古代时期